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知识、权力与自我

〔英〕杰拉德·德兰蒂 著

李瑞华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 Gerard Delanty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本书根据 SAGE Publication 2000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英)德兰蒂著;
李瑞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978-7-100-08678-3

I. ①现… II. ①德…②李… III. ①现代主义—研究
②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349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知识、权力与自我

[英] 杰拉德·德兰蒂 著

李瑞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678-3

2012年 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位法国诗人兰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兰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始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里有永恒的分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前言与致谢	1
导言 知识、权力与自我	1
一 现代性的话语：启蒙、现代主义和世纪末社会学	11
现代性的出现	12
走向现代主义	19
世纪末对现代性的批判	30
结论：竞争的现代性	45
二 现代性与世俗化：宗教与后现代挑战	47
布卢门伯格与现代性	49
现代性与传统	61
后现代主义与否定神学	68
结论：受到质疑的后传统主义	74
三 现代性的发病机理：启蒙的局限	76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作为大众欺骗	78
科瑟勒克：批判与危机	82
图尔明：现代性的隐秘议程	88

2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沃格林:现代性作为诺斯替教	94
阿伦特:政治之失落	97
结论:发展逻辑	103

四 现代性的不可能:文化的结晶化和偶然性问题

.....	106
后历史与文化结晶化	107
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作为确定性的丧失	113
卢曼:自我限制的现代性	120
结论:偶然性与交往	128

五 拯救现代性:社会领域的恢复

哈贝马斯:从历史到话语	131
勒斐伏尔和赫勒论日常生活	147
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图兰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157
结论:话语空间	165

六 后现代主义与社群的可能性

什么是社群?	170
社群在当代的恢复	174
超越社群主义:社群的后现代化	179
作为文化想象的社群	186
结论:反思的社群	190

七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后辩证法与社会领域的

审美化	191
后现代美学	193
作为解构理论的后现代主义	200

后现代化	205
后现代政治	214
结论：西方之外的后现代性	223
八 进一步的思考：后现代性之后的建构主义	228
注释	245
参考书目	252
索引	285

前言与致谢

本书可以看作对现代社会中两种转变的回应。第一种转变涉及社会世界观中的文化变化,亦即普遍知识模式层面上的变化,以及更广泛言之,时代的文化自我形象中的变化。这种文化自我形象乃是一个社会借以解释它自己的各种模式。第二种转变涉及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变化。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议题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论争直接相关,这一论争是近二十年来社会与政治理论中的核心争议之一。过去二十年里,社会与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这两种转变在某些方面同时发生了。一方面,老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有关16世纪以来从封建主义(后来是商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论争,如今被看作从传统向现代性的更普遍转变的一部分,因而此一转变也可以根据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冲突,或者用更晚近的说法,根据支配性的工具理性和文化批评之间的冲突,来加以理论化。而文化批评的活力乃是来源于公民社会的交往理性。在这一争论中,现代性的概念不仅仅是指资本主义(或者换句话说,工业主义),因此,转变最多可能会指向一个开放的日程,因为权力和文化、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斗争不可能这么容易就结束。事实上,不再能够从民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提出那种标准的批评。因此毫不奇怪,这一争论的结

果之一，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文化和社会转变的概念，从理论上必须被看作是在现代性自身之中开启可供选择的其他发展逻辑——从隐秘的历史到公民社会，到社会运动，到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因此在转而以现代性为参照框架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一步转变的观念就不过是一种发展逻辑而已。无论是因为这一争论凝固在了那看似永恒的冷战结构之中，还是因为没有一场主导性的运动出现，抑或是因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一种制度性的妥协，由此都可以得出一个虽有争议但可信的结论，这就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乃未竟规划的观点。之所以未竟，是因为现代性的工作由于许多因素而不可能终结，这些因素在他后来说的晚期现代所进入的那种“新晦暗”(new obscurity)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至此所隐含的主题就是，在现代之初所肇始的那一规划，也许已经不再有时间去实施了。

第二个争论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现代性本身可能被挫败，但它不是被获胜的资本主义挫败(尽管有些人对此极端含糊其辞)，而是被向后现代这个新时代的转变所挫败。至少在这种思想的某些更加纲领性的表述中，后现代据称已经到来。果真如此，那么现代性衰落的首要原因就是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以及这种紧张所开启的全部发展逻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然消失，但这确实意味着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已经减弱了，至于胜利者是谁，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共产主义衰落和冷战终结的语境中来看，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转变；甚至在极权主义条件下，这种转变也得到了民主之存留的极大帮助，尽管这种民主只局限于

公民社会的边缘。我这里说的是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独特之处乃在于几种发展逻辑或多或少是在同时展开：资本主义、民主、民族主义。这第二种转变可以看作被耽搁了的现代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伴随着一种更广泛的转变氛围，亦即文化、政治和社会上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因为共产主义的衰落恰恰发生在西方宣告后现代化之时（比如，文化生产、通信和金融产业中的全球化问题，信息社会的兴起，欧洲一体化，跨国社群，关于人权的新话语，生态学和自然政治）。许多对后现代论点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家，譬如阿兰·图兰，主张今天存在于理性力量和极权主义的新社群主义认同政治之间的新冲突，可以压倒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旧有斗争。文化挑战对社会问题的这种明显压制不再局限在民族国家这一相对稳定的坐标系内，其结果是，装备不良的民主所面临的最重要也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应付与文化认同相关的冲突，更不要说与生态学和自然有关的那些议题了（生态学和自然是新文化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这一框架表明，受有关民主的政治问题和有关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所支配的现代性，如今可以通过文化的棱镜加以折射，而在对现代世界观的这种重构中，存在着向认同和社群的转向，这一运动可以看作审美向日常生活的延伸。

显然，对于这种情形可以有两种看法。或者说，前苏联集团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沿工具理性路线前进的现代性的最后阶段，它与西方的唯一区别在于，支配的力量更多地集中在国家手中，而不是集中于生产方式。这多少是我所持的立场。或者也可以认为，这一事件是更广泛地向后现代转变的一部分，这

种转变与现今关于全球化的论争有关。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在晚期现代西方有其根源——它出现于欧洲,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种美国文化产物——但在远远超出欧洲的文化力量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达,因为正是在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日本和大部分伊斯兰世界,在西方世界里不可能出现的传统和现代性的创造性结合,在文化领域的后现代化中能够得到表达。这种结合在前苏联集团则更加不可能,在这些国家现代性建立在对传统的摧毁之上,它们那种大获全胜的现代性不仅仅是根据启蒙运动的形象来构造的,而且是由极权主义来构造的。因此,现代性的一种逻辑,即西方世界里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斗争,导致了从有组织的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运动(后现代性仍然处在现代性的范围之内);而另一种逻辑,即由国家推进的现代性,既压制了民主也压制了资本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必须看作是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在前一种逻辑中,文化现代性保留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基督教的传统;在后一种逻辑中,前现代的和现代的传统几乎被毁坏殆尽。只有在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地方,尤其像在日本这样未受西方化影响的地方,或者在没有完全经历殖民主义的大部分伊斯兰世界,传统才使自己适应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性,并因此使得向后现代性的转变较容易。在这些地方盛行着一种不同的发展逻辑;它不是民主和资本主义斗争的逻辑,也不是受斯大林主义引导的逻辑,而是为社群所激活的逻辑。

不管持何种立场,很显然,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都不会是现代性的另外一副面孔,即国家社会主义。剩下来的选择有三个,其中两个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也是本书的主题:要么是在现代性内

部寻求一种立场(民主来临的希望),要么是完全抛弃欧洲的现代性而服膺后现代性。后一种立场很复杂,甚至很混乱,因为后现代立场最初产生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某些发展中,后又与70年代北美艺术和建筑中一些完全不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并在80年代成为一场强有力的知识运动——当时正值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得势,左派在学术上的回应是理性选择理论,后现代派则独重文化议题。此时后现代主义最初的政治雄心已然衰竭,这或者是因为它已经实现了它的一些目标,或者是因为在一个唯物主义已经在文化上软化了的时代,它被吸收进了相对主义。由于一种全球性转变的感的加深,关于后现代性的论争变得更加复杂。全球化只不过是这种加快了的变化了另一种说法,它使多半后现代姿态变得可信,由此那些已经变成了“姿势”的“立场”如今可以在无时间的空间和非言语的交流模式中得到再生产。显然这是对一种知识环境的表达,此一环境见证了各种替代选择的消失,唯有去接受流动性。不过在西方之外,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与一种正在增长的意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后殖民世界正在出现。

我提到了第三种选择,亦即现代化的最终崩塌已然启动。对于那些既不想转向现代性也不想转向后现代性的人,世界主义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思想方式,可以把摆脱了启蒙的现代性同摆脱了全球化和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性联系起来。因为这种立场既不可以被还原成现代性,也不可以被还原成后现代性,而且它可能是把普遍主义道德观念同文化多元主义联系起来的唯一途径。在本书中,我从认识论上把这一视角同关于建构主义的各种新论争联系

起来。

本书是对这些议题之背景的研究。写作本书的着眼点,是要让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些主要经典论争能够为一般读者和社会科学研习者所理解。同时它也旨在向学者提供一个论题。导言和最后一章表达了我自己在这些论争中的立场,尽管这一立场的主要脉络贯穿于全书之中。我的立场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论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不应被看作对立的立场或现代社会的不同阶段,它们更应该看作有连续性的。简言之,本书提出了一个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连续性的论点,只不过这种连续性是根据发展逻辑的观念来构想的。这一发展逻辑是一种运动,即从前现代(在知识领域里)对怀疑主义的关切,到现代(在权力领域里)对话语性的关切,再到后现代(在自我领域里)对反思性的关注。因此后现代性可以看作是对在现代性之前即已出现的一个问题的增强了的意识。通过弱化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等同,有效地把它投射回历史之中,我希望也削弱了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与现代性的断裂。本书的论点可以用布鲁诺·拉托尔的说法概括为:我们不是后现代的,因为我们从来不曾现代。

1998年我在约克大学任社会学访问教授时,在多伦多写作了本书的大部分。我很感激约克大学的乔斯·伦纳兹和约翰·奥尼尔教授在此期间的慷慨相助。也要感谢戈登·达罗克和戴斯·埃利斯教授。还有听我课程的研究生,以及社会学系和社会政治思想项目的许多成员,也要向他们表示谢意。我很感激皮耶特·斯特莱多姆、托尼·金和帕特里克·奥马霍尼阅读本书的手稿并作出评论。最后,我要感谢克里斯·罗杰克,哲人出版社聘请的匿名

评审人,以及文稿编辑贾斯汀·戴尔。

于多伦多和利物浦,2000